

## 媒體系統變遷下的中國新聞報導： 美國、臺灣和香港的比較研究

李立峯、蕭蘋、吳浩銘\*

---

投稿日期：2022 年 8 月 9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12 月 15 日。

\* 李立峯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其著作包括 *Memories of Tiananmen: Politics and process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 in Hong Kong, 1989-2019*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1) 以及 *Media and protest logics in the digital e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他亦是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期刊總編輯以及國際傳播學會會士。e-mail: francis\_lee@cuhk.edu.hk。

蕭蘋為臺灣國立中山大學行銷傳播所教授，她的研究專長包括性別與媒介、廣告與文化、媒介的文本與內容分析。她的著作曾經發表在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ew Media and Society*, *Sex Roles* 等傳播期刊。e-mail: shawpin@cm.nsysu.edu.tw。

吳浩銘現為美國波士頓大學傳播學教授，他的研究重點是國際傳播和政治傳播，出版的書包括《媒體生病了：臺灣新聞環境的症狀與因應》（巨流）。e-mail: hdw@bu.edu。

本文引述格式：

李立峯、蕭蘋、吳浩銘（2023）。〈媒體系統變遷下的中國新聞報導：美國、臺灣和香港的比較研究〉，《新聞學研究》，156: 1-45。https://doi.org/10.30386/MCR.202307.0012

## 《摘要》

在新聞學研究中，有關國際新聞報導的分析經常強調，報導內容反映了由政治精英所界定的國家利益及當下政府的外交政策。但同時，媒體機構的立場和意識形態也可能影響報導內容。而在一段較長的歷史時段中，個別媒體機構的立場以至媒體系統的構成也可能出現轉變。究竟機構立場和媒體系統的變化如何影響報導內容？

本文指出，一個社會內不同媒體機構會否在報導國際或外地新聞時有明顯差異，視乎關聯政治的強弱和媒體系統內政治平行程度的高低。本文的經驗研究分析美國、臺灣和香港報章在 1977 年至 2017 年間如何報導中國。美國作為參照點，展示的是一個相對穩定而政治平行度不高的媒體系統的狀況。臺灣及香港的報業系統在研究所覆蓋的時段則經歷過明顯變化，包括新的媒體機構出現以及媒體政治平行的發展或重構。分析顯示，中國新聞報導的整體變化，的確部分地取決於個別媒體機構的立場轉變以及媒體系統的變化，但個別媒體機構和媒體系統的轉變結合起來時，有可能帶來中國報導在整體上和表面上的穩定性。文章結論部分討論研究結果在理論和方法學上的啟示。

關鍵詞：中國新聞、比較研究、政治平行、國際新聞、媒體系統、關聯政治

## 壹、導言

媒體是人們認知世界的窗口，面對著往往非常複雜而跟日常生活似乎有遙遠距離的國際事務，人們更需要依賴新聞媒體。雖然全球化已非新鮮事物，但直至近年，不少從事國際新聞研究的學者，仍然指出媒體在報導外地事務時的「國家」本位（Cohen, 2013; Tanikawa, 2019）。因此，一些由來已久的理論觀點，包括媒體在報導國際事務時傾向反映國內政治精英所建構的國家利益（Lee, Chan, Pan, & So, 2002），以及媒體把國際新聞本地化的傾向（Cohen, Levy, Roeh, & Gurevitch, 1996），仍被視為適用。

不過，過往關於國際新聞的研究較少關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媒體系統轉變如何影響國際新聞報導。這部分是由於過往研究較少覆蓋一段很長的時間，以關於媒體如何報導中國的研究為例，文獻中的研究多聚焦在個別事件、個別年分，或最多是十年至二十年的光景之上。但如果進行的是一個橫跨數十年的研究，那麼在個別國家和地區，媒體系統就可能出現明顯轉變，包括新的具影響力的媒體機構冒起以至媒體政治光譜的重構等，這一方面會帶來方法學的挑戰，涉及抽取樣本和媒體可比性等問題，另一方面也同時帶來一個理論問題，即媒體系統的變遷如何影響新聞報導的特徵。

本文以美國、臺灣和香港報章從 1977 年至 2017 年的中國新聞為例去探討以上的問題。撇除諸如數位化和媒體經營問題等挑戰，美國的報業系統在這段期間相對穩定。同時，美國報業的政治平行（political parallelism）度不高（Hallin & Mancini, 2004, pp. 208-209），美國個案可以用來印證一些現存文獻中的觀點，以及為臺灣及香港提供一個參照

點。至於臺灣和香港，雖然以兩岸三地的特殊關係，中國新聞至少不是典型的「國際新聞」，但正是因為關係的獨特性，使得不同立場媒體機構的中國報導很可能有明顯差異。同時，兩地在 1977 年至 2017 年間，分別因民主化和主權移交出現了巨大的政治和社會變遷，媒體系統亦因而有顯著轉變。我們可能需要仔細探究媒體政治立場和系統變化的影響，才能更準確地了解兩地媒體的中國報導的變與不變。

因此，本文嘗試對學術文獻帶來兩方面的貢獻。一方面是在普遍的層次上了解媒體系統轉變對國際新聞報導可能帶來的影響，第二方面是對美國、臺灣和香港媒體如何報導中國提供細緻分析，為個別機構以至整個媒體系統的報導傾向提供實證數據。

下文先回顧關於全球媒體如何報導中國的學術研究，以及討論國際新聞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理論觀點，從而進一步闡釋媒體系統轉變可能帶來的影響。文章然後會簡單討論美國、臺灣和香港的報業系統在研究所覆蓋的時間中的特徵，帶出指導經驗分析的研究假設和問題。之後，我們會介紹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對美國、臺灣和香港三個個案逐一分析。結尾部分討論分析結果帶來的啟示。

## 貳、文獻回顧和理論觀點

隨著中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問題上日益舉足輕重，世界各地的媒體如何報導中國繼續受到不少學者關注。舉例來說，Willnat & Luo (2011) 分析了 15 個國家的電視新聞，發現各國電視新聞中的中國報導分量並不太多，議題上注重政治和經濟，對社會和文化的報導較少。報導傾向性方面，Ooi & D'Arcangelis (2017) 發現，從 1990 年代到 2010 年代，美國媒體和政界論述對中國的描述越來越負面，在貨幣價格

和科技發展等問題上，中國常被形容為盜賊或惡霸。McCourt (2021) 的文章也指出同樣的轉變。Yu & Wang (2017) 分析西方英語媒體的中國報導，也發現一個整體的負面傾向，而報導量和議題則因應中國的重要性的轉變和重大事件的發生而異。Wilke & Achatzi (2011) 發現德國媒體的中國報導在 1989 年之後變得非常負面，但隨著報導焦點逐步由政治議題轉向經濟議題，德國媒體的中國報導的負面傾向在 2000 年後有所減退。Ojo (2016) 對兩本非洲財經雜誌的分析，則發現該兩本雜誌均正面描述中非關係。Zhu & Lu (2013) 分析了不同國家對中共立國 60 周年的報導，發現民主國家的媒體在報導時較有可能出現負面傾向。

現存的研究對媒體系統內不同機構的中國報導之間的差異著墨不多。一些研究發現同一國家中不同機構的報導頗為一致，例如上面提及的 Ojo (2016)，又例如 Peng (2004) 比較《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從 1992 年至 2001 年的中國報導，發現兩份報章的報導傾向和框架均沒有差異。不過，也有一些研究指出了同一國家中不同立場的媒體之間的差異。例如 Golan & Lukito (2015) 比較《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的社評及評論文章如何討論中國，發現兩份報章均反映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取向，但同時，《紐約時報》的評論較傾向視中國為冒起中的經濟強國，《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文章則較具敵意，也較強調中國對美國的威脅。上段提及 Wilke & Achatzi (2011) 對德國報章的分析，也發現較為右傾及關注經濟議題的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在報導中國時比起左傾的 *Sueddeutsche Zeitung* 正面一些。

過往的國際新聞研究較少注重同一國家內部媒體機構之間的差異，大概跟文獻中的主流理論觀點相關。從政治經濟學立場出發，新聞媒體被視為深嵌於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之中，在新聞工作中，記者也常依賴官方消息來源。在處理國際新聞時，非官方消息來源的選擇可能更

少，依賴官方消息來源的情況可能更嚴重（Althaus Edy, Entman, & Phelan, 1996; Bennett, 1990; Zaller & Chiu, 1996）。因此，在報導國際新聞時，新聞媒體往往會反映由當權者及政治精英所理解和建構的國家利益，以及當下政府的外交政策。如 Lee et al. (2002) 所說，媒體是通過「國家稜鏡」去看世界的。這個「國際新聞反映國家利益」的觀點，在過去三十多年的研究中被重覆印證（Archetti, 2010; Bergman, 2014; Jang, 2013; Kim, 2000; Lee & Wang, 2016; Lee & Yang, 1996）。

當國家利益占主導地位時，媒體機構之間就算有差異，差異也會局限於一個較窄的幅度之內，Lee (2002) 提出了「建制內的多元主義」（established pluralism）的概念，指出美國主流媒體就著各種問題的確有不同聲音，但絕大多數聲音都是有建制精英支持的，合法爭議的領域（Hallin, 1986）非常狹窄。Ha (2017) 在較近期的研究，比較了《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關於阿拉伯之春的評論文章，其發現也再次支持了建制內的多元主義的說法。

國家利益之外，同時值得一提的是關於國際新聞本地化的分析。由於外國事務跟本地民眾的距離較遠，本地民眾亦大都對外國事務缺乏深厚的背景知識，媒體在報導外國和國際新聞時往往有將其本地化（domestication）的傾向（Alasuutari, Qadir, & Creutz, 2013; Clausen, 2004; Cohen et al., 1996），為求本地民眾可以更容易理解新聞內容及國際事務的重要性。本地化可以通過強調外國或國際事務如何影響自己的國家、強調本國人物或組織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把外國的狀況和本地的狀況作對比、把外國文化跟本地文化扣連等方式進行（Lee, Chan, & Zhou, 2011; Tanikawa, 2017）。在更基本的層次上，文化親近性（cultural proximity）是新聞媒體選擇是否及如何報導特定國外事件或議題的重要考慮之一（Hanusch, 2008）。對本文而言，文化因素的重要

性，也可能蓋過媒體之間因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不同而產生的差異。

不過，我們也有原因對媒體政治立場的影響多加關注，除了是因為機構層面的因素始終有可能影響報導內容之外（Shoemaker & Reese, 1991），也是因為國際新聞的內容往往是本地政治的延伸。周葆華（2010）提出了關聯政治的說法，指出國際新聞和國內新聞其實是有關聯的，國際新聞的內容很多時候都服膺於國內政治的需要。在中國，關聯政治的體現主要在於國際新聞的內容如何通過自我優先、內外對比，以及敏感新聞最小化等策略，鞏固國家政權的合法性（相關討論也可參考 Ji & Liu, 2022）。如果放在一個媒體多元的社會中，關聯政治則可能令不同立場的媒體在報導特定國際或國外事件時呈現不同立場。例如 Ha & Shin（2016）分析了四份南韓報章對阿拉伯之春的報導，發現自由派和保守派報章表達了不同傾向，自由派報章較多強調中東抗爭運動的社會經濟原因，並對美國的中東政策有較多批評，保守派報章則多強調阿拉伯之春對中國及北韓可能產生的影響。作者認為，保守派報章對阿拉伯之春的態度跟他們本身支持對北韓採取強硬政策的立場相關。另外，Castelló, Dhoest, & Bastiaensens（2013）對西班牙和比利時媒體如何報導對方國內的分離主義運動的分析，提供了更明顯的例子。他們指出兩個國家的媒體均視對方為一面映照自身的鏡子，而並不出奇的是，西班牙加泰地區的報章會較馬德里地區的報章對佛蘭德民族主義作更正面的報導。在比利時，佛蘭德語的報章則比法語報章更關注加泰地區。

從這些過往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指出兩個最基本的因素，會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媒體機構會否在報導特定的國際新聞時有顯著差異。第一個因素是這地區的媒體系統中媒體政治平行程度的高低。Hallin & Mancini（2004）把媒體與政黨或政治派別之間的關係視為媒體系統的主要維度之一，媒體政治平行程度高，即媒體光譜與政治場域的光譜高

度重疊，媒體在報導新聞時會有更明顯的黨派傾向。第二個因素就是關聯政治的強弱。當一件外國或國際事件跟本地政治扣連起來，媒體在報導時就更有可能受到其本身對本地政治議題的立場影響。加起來，當媒體系統有高度政治平行狀態，同時所報導的國際事務緊扣本地政治，本地媒體機構在進行報導時就可能受機構政治立場影響，不同媒體機構之間可能出現非常顯著的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對一個國家或地區而言，無論是媒體系統的政治平行程度，抑或是國際事務和本地事務的扣連，都可以隨時間而轉變。如果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媒體進行長時期的比較及追蹤研究，這種轉變會帶來額外的方法和理論問題。在方法學的層面，研究者需要處理的是可比性的問題，假設一個社會原本只有兩家媒體，然後在某個時段出現了第三家具影響力的媒體，那麼作長時期比較時，如果只分析業已存在的兩家媒體，表面上會在媒體取樣上具一致性，但可能難以準確掌握後期的狀況。尤其重要的是，在一個媒體系統中，媒體機構會互相影響，媒體機構之間往往有競爭關係，當一個新的和具影響力的媒體機構出現時，現存的媒體要考慮如何回應，包括選擇同化（*assimilation*）還是分化（*differentiation*）的對策（李立峯、鄧鍵一，2013）。所以，在不同時期選擇不完全一樣的媒體機構作為樣本，往往是更合理的做法。

不過，這個做法所帶來的理論和分析問題，就是如何去理解媒體系統轉變的影響。如果一個地區的媒體對某種國際事務的報導在不同時期出現了明顯的轉變，那是因為該地區各媒體機構同時出現同樣形式的轉變？只是部分媒體機構出現轉變？抑或是新出現的媒體機構促成了整體上的轉變？相反，如果一個地區的媒體對某種國際事務的報導在不同時期之間並沒有明顯轉變，那是因為所有媒體機構的報導均沒有轉變？抑或是個別媒體機構的轉變以及媒體系統的發展，剛巧互相抵銷，帶來整



體上的不變？這些問題，對我們如何理解個別地區的媒體報導內容是重要的。

## 參、美國、臺灣和香港的媒體變化和中國報導

本文將對美國、臺灣和香港媒體在 1977 年至 2017 年間的中國報導作出分析，以探討上一節所闡釋的重心問題。這一節將分別簡述三地的媒體生態及三地與中國的關係在過去四十多年的變化，以提出較具體的研究問題和假設。

我們可先從美國入手。前面已經提及，美國媒體生態在過去數十年固然也因社會和科技轉變而受到各種衝擊，但在跟本研究最相關的層面，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並沒有太大變化。尤其是報章方面，從 70 年代中期到現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華爾街日報》仍被廣泛視為最具影響力及象徵意義的美國報章。他們的影響力不只在於讀者人數和背景，也在於他們有能力替其他媒體設置議程（Denham, 2014; Golan, 2006）。立場方面，一般研究者會指出，《紐約時報》較傾向（美國政治意義下的）自由主義，《華爾街日報》則較傾向保守主義，例如會較強調自由貿易等（Kim & Shahin, 2020），但傳統上，美國媒體跟政黨的關係並不密切，政治立場並不特別徑渭分明，正如 Gans（1979, pp. 43-48）指出，美國主流媒體更大程度上是共同反映了「負責任的資本主義」和「利他性民主」等美國社會的恆久價值。縱使美國媒體和社會在過去二十年間有較明顯的兩極化趨向（Prior, 2013），但整體上，美國媒體的政治平行程度並不算高。

在中國報導方面，不少研究指出美國媒體的中國報導傾向負面（Peng, 2004），而且這負面傾向在過去二十年有上升的趨勢（Ooi &

D’Arcangelis, 2017)。這也符合一般對中美關係的轉變的理解。在上世紀 70 年代，中美建交並形成了對抗蘇聯的策略聯盟，而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和改革開放，積極交往（engagement）成為了美國對中國的基本政策。所以，我們視 80 年代的中美關係為較為友好的。但隨著天安門事件以及 90 年代中國開始崛起，中國威脅論也開始出現（Medeiros, 2000）。在柯林頓（Clinton）時期，積極交往政策仍是主調，在新世紀之初，美國亦幫助了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但在同一時間，中國威脅論——即中國的崛起可以在可見未來為區域安全和穩定帶來負面影響（Roy, 1996），在美國政圈中有廣泛討論。同時，中國威脅論也出現於媒體上，例如 Yang & Liu（2012）就指出，美國媒體自 90 年代初開始討論「中國威脅」，因應事件的發生和國際形勢轉變，在 1996 年、2000 年及 2005 年有三次高峰。當然，中美之間是友好還是敵對是一個程度問題，也有論者指出，中美關係要到川普（Trump）時代才較明顯和全面的交惡（McCourt, 2021）。但整體上，我們可以預期的是，從 70 和 80 年代到 90 年代和 2000 年後，美國媒體的中國報導會變得越為負面。

不過也要留意的是，隨著中國經濟冒起，美國跟中國保持策略伙伴關係的誘因一直存在。所以，我們也要留意政治新聞和社會經濟類新聞之間的差異。美國媒體的中國報導越見負面的傾向，應在政治新聞中尤其明顯。綜合這些觀點，我們可以就著美國個案提出四個研究假設，H3 和 H4 關注不同報章之間的差異，是本文重點，H1 和 H2 則建基於傳統的媒體反映國家利益的理論觀點：

H1：美國報章在 90 年代及之後的中國報導，比在 70 及 80 年代的報導較為負面。

H2：H1 提及的負面轉向，在政治新聞上會較在經濟和社會新聞上明

顯。

H3：《紐約時報》及《華爾街日報》的中國報導，在傾向上並沒有明顯差異。

H4：《紐約時報》及《華爾街日報》的中國報導，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了同樣的負面轉向。

相對於美國，臺灣媒體系統從 1970 年代至今有非常明顯的轉變。臺灣在 1949 年頒佈戒嚴令，1951 年實施「報禁」，直至 1988 年才正式解除。在解嚴和報禁時代，跟國民黨黨機關有直接和密切關係的《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是最重要和具影響力的報章（Chen, 1998）。報禁解除後，在 1987 年易名的《自由時報》影響力上升，並逐漸確立了偏向民進黨的立場。臺灣報業亦因此出現了明顯的政治平行，《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是最重要的藍營報章，《自由時報》則是最重要的綠營報章。另外，香港壹傳媒集團在 2003 年於臺灣出版臺灣《蘋果日報》，以香港的大眾化報章風格打進臺灣市場，並佔據了一定的市場份額（Rawnsley & Rawnsley, 2006）。政治上，壹傳媒及其創辦人黎智英有明確的反共立場，但《臺灣蘋果》較看重市場運作，對臺灣藍綠陣營之間的政治不多作介入（較完整的對臺灣報業的梳理，可參考陳致中，2016）。

不得不提的是，同屬藍營的《聯合報》和《中國時報》之間也可能有重要差異。2008 年，旺旺集團總裁蔡衍明收購中時集團，成立了旺旺中時媒體集團。集團的跨媒體力量加上蔡衍明的親大陸立場，觸發了 2012 年的「反媒體巨獸運動」（Rawnsley & Feng, 2014）。我們可以預期，在當下的中國新聞報導上，《中國時報》相對上會最為正面，《聯合報》次之，然後是在臺灣政治上「中立」的《臺灣蘋果》，最為負面的是《自由時報》。

如果從歷史的維度看，兩岸關係在過去數十年也有重要轉變。中國內戰之後，國共關係固然是從敵對開始，但 70 年代中美建交，重整了國際關係之餘，亦使臺灣開始在外交上變得越來越孤立。臺灣政府亦要重新思考兩岸關係，而中國同時進行改革開放，使兩岸在 70 至 80 年代開始重新交往，中共表達了和平統一的願望，中華民國也在 1987 年放寬臺灣居民赴大陸探親，其後兩岸開始討論「三通」的問題。所以，在 70 年代最後期至 80 年代，兩岸關係是邁向積極交往的方向發展的。不過，臺灣在 90 年代民主化，意味著兩岸的政治體制越發不一樣，亦為傾向臺獨的民進黨執政提供了可能性。同時間，臺灣居民的本土認同於 90 年代開始有明顯的上升趨勢，從 1993 到 2002 年，認為自己純粹是「中國人」的臺灣民眾比例，由 33.4% 下降至 7.9%，認為自己純粹是「臺灣人」的比例，則由 27.1% 上升至 38.0% (Chu, 2004, pp.501-502)。基於這兩個因素，90 年代之後的兩岸關係，一方面會因應究竟是國民黨抑或民進黨執政而有一些差異 (Hsu, 2014)，但整體上，兩岸有越走越遠的趨勢，發展到 2010 年代，兩岸的隔閡尤其明顯地反映在 2014 年的太陽花運動以及 2019 年香港社會運動對臺灣政局的影響之上 (Ho, 2019, 2021)。

固然，跟美國的情況一樣，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兩岸互動，也會增加臺灣在兩岸關係中的利益計算的複雜性。自 90 年代，臺灣媒體也多了派記者長駐中國大陸，尤其是一些如東莞等臺灣廠商的聚集地 (Cheng & Lee, 2015)。本研究分析《自由時報》、《臺灣蘋果》、《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四份報章。綜合以上討論，我們提出幾個研究假設和問題。跟之前關於美國的討論類似，H7 和 Q1 關注不同報章之間的差異，H5 和 H6 則建基於傳統的媒體反映國家利益的理論觀點：

- H5：臺灣報章在 90 年代及之後的中國報導，比在 70 及 80 年代的報導較為負面。
- H6：H5 提及的負面轉向，在政治新聞上會較在經濟和社會新聞上明顯。
- H7：四份臺灣報章的中國報導在傾向上有明顯的差異。
- Q1：臺灣報章的中國報導的變化或不變，是如何由個別媒體的變化以及新的報章的出現而構成的呢？

從 1970 年代到現在，香港報業也經歷了巨大轉變。二戰後的香港中文報業有明顯的以中國政治為參照的政治平行，有親國民黨和親共產黨的右派及左派報章（Chan & Lee, 1991）。但 70 年代香港人本土意識萌芽（Ma, 1999），媒體亦慢慢地有了更強的本土取向（李立峯、鄧鍵一，2013）。80 年代初開展的香港前途談判及其後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使香港進入了過渡期。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香港媒體漸漸向未來的權力中心（即中國）靠攏，右派報章逐步退出了舞臺（如《華僑日報》結業），又或者展現了立場的轉變（如《星島日報》慢慢變得親中）（Chan & Lee, 1991）。

雖然政權移交帶來了新的政治經濟架構以及媒體自我審查的現象，新聞自由蒙上陰影（區家麟，2017），但香港媒體在回歸後並未完全服膺於權力之下。這部分有賴新聞從業員的專業主義，部分有賴市場運作的力量（C. Lee, 2000; F. Lee, 2018）。其中《蘋果日報》在 1995 年創刊，以支持民主作為市場定位，獲得不少市民支持，再加上高度商業化的報導方式，長期成為香港銷量第二高的報章（首位為《東方日報》）（梁麗娟，2006）。因此，回歸後的香港媒體生態，一方面因政治經濟結構的影響使大部分主流媒體受到政治壓力，但另一方面也因《蘋果日報》、電臺烽煙節目等批判性媒體平臺的存在而獲取了喘息的空間。報

章要在市場上生存，也需要顧慮自己的公信力。如何同時處理政治壓力及保留專業精神成為不少主流媒體要面對的課題，例如在回歸初期，《明報》就以更明顯地標榜客觀中立來回應社會政治環境的轉變（Lee & Lin, 2006）。也因此，直至 2019 年為止，香港媒體仍然展現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平行。

整體上，在政權移交下，我們可以預期香港報章的中國新聞，於回歸後會變得比之前正面（或至少沒那麼負面），但我們也可以預期，報章之間的差異仍然存在：《蘋果日報》的中國報導應最為負面，其後是《明報》等嘗試保持專業性的媒體，之後是如《星島日報》等較大程度上傾向了權力中心的媒體，而由共產黨直接控制的如《大公報》和《文匯報》等左報，則會非常正面地報導中國。同時，政治和社會新聞的分野亦非常重要，媒體要保存專業形象，在報導相對沒有那麼敏感的社會和經濟議題時應有較多批判，在報導政治議題時，向權力靠攏的現象可能較為明顯。本研究分析《明報》、《星島日報》、《蘋果日報》，以及《文匯報》四份香港報章。總括而言，我們可以提出以下的假設和研究問題：

H8：香港報章在回歸之後的中國報導，比在 70 及 80 年代的報導較為正面。

H9：H8 提及的正面轉向，在政治新聞上會較在經濟和社會新聞上明顯。

H10：四份香港報章的中國報導在傾向上有明顯差異。

Q2：香港報章的中國報導的變化或不變，是如何由個別媒體的變化以及新的報章的出現而構成的呢？

在進入分析前，我們可簡單總結本研究的基本框架（表 1）。本研

究主要從三方面的考慮，包括由 70 年代後期至 2010 年代三地與中國的關係、三地媒體系統的政治平行程度，以及中國新聞在三地的關聯政治的強弱，得出對中國報導的特徵的預期，包括中國報導的整體傾向如何轉變、不同新聞題材的差異，以及不同媒體機構之間的差異。

**表 1：研究框架**

	從 70 年代後期 到近年與中國的 關係	政治平行 程度	關聯政治	預 期
美國	從友善和互動政 策到越見明顯的 張力和對抗	低、不變	弱	媒體在整體上對中國態度轉 向相對負面，尤其在政治新 聞方面，而報章之間的差異 不大
臺灣	從兩岸恢復互動 交往到體制和意 識形態差距日益 擴大	從低變高	強	媒體在整體上對中國態度轉 向相對負面，尤其在政治新 聞方面，但報章之間在後期 會有明顯差異
香港	從英國殖民地轉 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特別行政區	高	強	媒體在整體上對中國態度轉 向相對正面，尤其在政治新 聞方面，但報章之間會有明 顯差異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另一個值得先多加說明的問題，是幾個研究假設之間的關係。在每個地區，我們先根據「國際新聞反映國家利益」的觀點設立第一個假設，其後再提出新聞內容可能因題材和報章立場而異。需要指出的是，在邏輯上，第一個假設與其後的假設或問題並不矛盾。一個社會可以因

政治環境轉變，使媒體系統出現了政治平行，不同媒體機構之間可以在報導某事情時有差異，但同時，當媒體機構整合起來考慮時，媒體系統仍有可能在整體上對該事情有某種報導傾向。例如一個地方的媒體可以因社會文化轉變，變得越來越支持某議題，但同時不同媒體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正面轉向，「媒體系統整體上轉變傾向」和「不同媒體機構之間有差異」是可以並存的。當然，政治平行的出現實際上會如何影響媒體系統在整體上的傾向轉變，則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

## 肆、研究方法和數據

本研究的數據來自一個美國、臺灣和香港的中國新聞比較研究。研究的時間設定為 1977 年至 2017 年。1977 年是中國大陸文革結束後的一年，是一個新開端。基於可行性的考量，研究分析的是 1977、1987、1997、2007 以及 2017 五個年分。在每一個被選取的年分裏，三地的負責人分別隨機選取兩個星期一、兩個星期二等，從而建立兩個構造周（constructed week）。在美國及臺灣，於該 14 天中在每一份包括在研究範圍內的報章上刊登的中國新聞均被包含在樣本之內。在香港，尤其在中國開放之後，新聞報導量很大，所以 1987 年及之後的樣本，只包括每天最多六篇中國新聞報導（根據縮微膠捲或資料庫中可見的版面配置資料選取最重要的六篇，例如放在要聞版或較前版面的中國新聞會被優先選取）。之前已經提及，美國的樣本包括較傾向自由主義的《紐約時報》和較傾向保守主義的《華爾街日報》，臺灣的樣本包括親藍營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親綠營的《自由時報》，以及源自香港的《臺灣蘋果日報》，香港樣本則包括傳統左派報章《文匯報》、支持民主派的《蘋果日報》、強調專業中立的《明報》，以及曾屬右派報章，



但在政治變遷過程中轉為親政府的《星島日報》。表 2 顯示三地共十份報章於五個年分的文章數量。

如表 2 所示，美國的樣本數較臺灣及香港的樣本量小。臺灣及香港是大中華地區的成員，對中國大陸的各種事件和發展自然格外關注。但樣本數的差異不應對本文的分析構成太大影響。另外，跟本文主旨直接相關的是，《自由時報》在 1987 年創立，我們的研究中只在 1997 年開始包括該報章，《臺灣蘋果》則在 2007 年開始才被包括在樣本之內。

表 2：10 份報章在研究樣本中的文章數量

國家	報章	1977	1987	1997	2007	2017
美國	紐約時報	42	32	70	71	61
	華爾街日報	12	44	94	74	53
臺灣	中國時報	44	55	298	70	50
	聯合報	51	55	163	93	85
	臺灣蘋果	---	---	---	200	112
	自由時報	---	---	96	127	178
香港	文匯報	89	84	84	82	84
	星島日報	105	81	79	84	83
	明報	89	84	84	82	84
	蘋果日報	---	---	84	83	79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表。

在香港，《蘋果日報》也是在 1997 年才被包括到樣本之中。為簡便起見，我們以下的分析會把 1977 及 1987 年合併起來，1997 至 2017 年亦合併起來，成為兩個階段。這個分隔主要是考慮媒體系統的轉變，對臺灣來說，兩個階段代表的是親國民黨報章壟斷時期以及政治平行形

成時期，對香港來說，兩個階段代表的是《蘋果》出現的前和後。同時，如果看三地跟中國的關係，上述的階段二分法亦有其合理性：對香港而言，那是回歸的前與後，對臺灣而言，是民主化的前與後，對美國而言，則涉及冷戰後期和後冷戰時期與中國的關係。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只集中分析五個年分，是一個局限。但把五個年分拆為兩個階段，每一個階段由兩至三個年分代表，可以約略減輕特定年分的特殊性可能對研究結果產生的影響。另外，以 1977 年至 1987 年和 1997 年至 2017 年作為兩個階段，並不涉及把某一個特定年分作為歷史或中國發展的分水嶺，其背後假設的只是中港關係、兩岸關係，以及中美關係在兩個階段之間均有重要的差異。

內容分析以每篇文章作為觀察及分析單位。研究團隊建立了一個共同的編碼表，其中包括文章的基本特徵、報導框架、報導議題、對中國的態度、對中國的稱謂、首三位被引述的消息來源等變項。本文分析主要使用的是報導議題和文章對中國的態度。對中國的態度分為正面、負面或者中性，在編碼時，一篇文章的態度視乎題材、角度，以及用字，是一個整體的判斷。典型的正面報導的例子包括聚焦經濟發展的成果、談論令民眾受惠的政策改革、社會上出現的「好人好事」等等，負面報導的例子包括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貧富差距等。

報導議題方面，我們借用 Cohen (2013) 所進行的跨國電視國際新聞研究中對議題的劃分，再加以修正，成為一個共有 27 個類別的變項，包括國內政治、國際政治、軍事、社會秩序、經濟、教育、社會福利、運輸、文化等等。一篇文章可以屬多個議題，但編碼員會判斷文章的主要議題是什麼。下面分析使用的是「文章主要議題」這變項，同時，因應本文需要，我們把 27 個議題歸納為政治新聞以及經濟與社會新聞兩類，前者包括國內政治、國際關係、軍事及國防，以及國內秩

序，後者則總括所有其他題目。在進行正式編碼前，三地的研究助理分別進行了訓練，並測試了編碼者信度，三地的編碼均達致可以接受的信度，在本文有使用到的變項中，三地的編碼者信度均達致 Scott's pi 高於 0.80 的程度。

## 伍、分析結果

### 一、美國報章的中國新聞

這一節先探討美國報章的中國新聞。表 3 顯示，在第一階段，兩份美國報章的中國報導之中，22.2% 對中國持正面態度，16.0% 對中國持負面態度，61.7% 為中性。在第二階段，對中國持正面態度的文章比例降至 14.8%，持負面態度的文章比例則較為大幅度地升至 34.3%，中性報導的比例下降至 50.9%。以報導數量作為基礎進行卡方測試發現，報導立場的變化達統計上的顯著程度。如 H1 預期，美國報章的中國報導在第二階段較第一階段負面。

如果將政治新聞跟經濟與社會新聞分開，我們可以看到，於第一階段，29.3% 在美國報章上關於中國的政治新聞屬正面，9.8% 屬負面，61.0% 為中性。在第二階段，關於中國的政治新聞報導，持正面態度的比例大幅下降至 11.3%，持負面態度的比例大幅上升至 52.1%，中性報導百分比下降至 36.6%。亦即是說，在這個時期，負面報導占主導，在卡方測試中，報導傾向在兩個時期之間的轉變達統計學上的顯著度。

表 3：美國報章的中國報導傾向

	正面	負面	中性
第一階段 (81)	18 (22.2%)	13 (16.0%)	50 (61.7%)
第二階段 (344)	51 (14.8%)	118 (34.3%)	175 (50.9%)
$\chi^2 = 10.76^{**}$			
政治新聞			
第一階段 (41)	12 (29.3%)	4 (9.8%)	25 (61.0%)
第二階段 (142)	16 (11.3%)	74 (52.1%)	52 (36.6%)
$\chi^2 = 24.61^{***}$			
經濟與社會新聞			
第一階段 (40)	6 (15.0%)	9 (22.5%)	25 (62.5%)
第二階段 (202)	35 (17.3%)	44 (21.8%)	123 (60.9%)
$\chi^2 = 0.13$			

註：階段旁括號內的數字為樣本數。表格內主要數值為觀察數值和以每列作基礎的百分比。\*\*\*  $p < .001$ ; \*\*  $p < .001$ 。

在表 3 的基礎上，我們現在可以分析《紐約時報》及《華爾街日報》之間的差異。表 4 顯示，在第一階段，33.3% 的《紐約時報》的中國政治新聞屬正面，只有 9.1% 屬負面，57.6% 為中性報導。在同一階段的《華爾街日報》，12.5% 的中國政治新聞屬正面，12.5% 屬負面，75.0% 屬中性，從百分比看，《紐約時報》的正面報導較多。不過，由於這時期《華爾街日報》的中國政治新聞數量非常少，所以兩份報章之間的差異仍未達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由於個別檢定格子的期待次數低於 5，所以統計分析用的是 Fisher's Exact Test，結果  $p$  值等於 0.49）。

表 4：美國報章的中國報導題材與報導傾向

	正面	負面	中性
政治新聞			
第一階段			
紐約時報 (33)	11 (33.3%)	3 (9.1%)	19 (57.6%)
華爾街日報 (8)	1 (12.5%)	1 (12.5%)	6 (75.0%)
$\chi^2 = 1.35$ ( $p = .49$ in Fisher's Exact Test)			
第二階段			
紐約時報 (77)	6 (7.8%)	42 (54.5%)	29 (37.7%)
華爾街日報 (65)	10 (15.4%)	32 (49.2%)	23 (35.4%)
$\chi^2 = 2.04$			
經濟與社會新聞			
第一階段			
紐約時報 (24)	5 (20.8%)	4 (16.7%)	15 (62.5%)
華爾街日報 (16)	1 (6.3%)	5 (31.3%)	10 (62.5%)
$\chi^2 = 2.27$ ( $p = .31$ in Fisher's Exact Test)			
第二階段			
經濟與社會新聞			
紐約時報 (80)	13 (16.3%)	22 (27.5%)	45 (56.3%)
華爾街日報 (122)	22 (18.0%)	22 (18.0%)	78 (63.9%)
$\chi^2 = 2.55$			

註：報章旁括號內的數字為樣本數。表格內主要數值為觀察數值和以每列作基礎的百分比。

與此情況不一樣，在經濟與社會新聞中，美國報章的態度在兩個時期並無顯著差異。在第一階段，15.0% 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屬正面，22.5% 屬負面，62.5% 為中性，在第二階段，三個百分比分別為 17.3%、21.8%，和 60.9%，跟第一階段中的數值非常接近。這些數據支持 H2，即美國報章的中國報導的負面轉向，在政治新聞中尤其明顯。

在第二階段，《紐約時報》的中國政治新聞中，7.8% 屬正面，54.5% 屬負面，37.7% 為中性，《華爾街日報》的相關報導中，15.4% 屬正面，49.2% 屬負面，35.4% 為中性。在卡方測試中，兩份報章之間也沒有顯著差異。

分析結果跟 H3 的預期一致。同時，如果我們比較同一報章在兩個時期之間的差異，我們會發現，《紐約時報》的中國政治新聞的負面轉向在卡方測試中達到了統計學上的顯著度 ( $\chi^2 = 23.517, p < .001$ )，《華爾街日報》在第一階段的中國政治新聞數量雖然非常少，但其負面轉向也幾乎達至統計學上的顯著度 ( $\chi^2 = 4.98, p < .10$ )。這結果跟 H4 一致：兩份報章的中國政治新聞，在兩個階段之間出現了同樣的負面轉向。

至於經濟與社會新聞，表 4 顯示，在第一階段，《紐約時報》的中國經濟與社會報導中，正面態度占 20.8%，負面態度占 16.7%，中性的占 62.5%，《華爾街日報》的中國經濟與社會報導中，正面態度有 6.3%，負面態度佔 31.3%，中性占 62.5%，兩份報章之間的差異並未達至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由於個別檢定格子的期待次數低於 5，所以統計分析用的是 Fisher's Exact Test，結果 p 值等於 0.31）。在第二階段，《紐約時報》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中，16.3% 屬正面，27.5% 屬負面，56.3% 屬中性，《華爾街日報》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中，正面和負面報導均占 18.0%，中性報導占 63.9%，兩份報章之間的差異更小，在卡方測試中自然亦未達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同時，兩份報章自身在

兩個階段中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均沒有態度上的顯著轉變。

總括來說，分析基本上支持了所有關於美國報章的假設，美國報章的中國報導在第二階段比在第一階段時負面，這負面轉向在政治新聞中尤為明顯，在經濟與社會新聞中則並不存在。誠然，在第一階段中，兩份報章的中國政治新聞報導量都很少，樣本數的限制可以是兩份報章之間缺乏統計學上顯著差異的部分原因。不過，縱使承認第一階段樣本數的限制，對整體分析結果以及我們應如何理解美國媒體仍然不會構成重大影響，即兩份報章的中國政治新聞在兩個階段之間確出現了相同的負面轉向，而兩份報章在第二階段中的中國新聞並沒有明顯的態度差異。這些結果切合了文獻中對美國媒體的看法，即其國際新聞切合國家利益，以及美國媒體之間政治平行度較弱。

## 二、臺灣報章的中國新聞

我們現在開始分析臺灣的情況。表 5 首先顯示臺灣報章的中國報導在整體上的態度傾向。在第一階段，臺灣報章中只有 0.5% 的中國報導持正面態度，持負面態度的高達 45.9%，中性的則有 53.7%。但在第二階段，臺灣報章的中國報導中，正面的比例稍為上升至 3.9%，負面報導下降至 25.1%，中性報導則上升至 71.0%。在卡方測試中，兩個時期的百分比分布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但跟 H5 的預期相反，臺灣報章在第二階段中，負面傾向有所下降，但上升的主要是中性的報導，正面報導仍然非常之少。

表 5：臺灣報章的中國報導傾向

	正面	負面	中性
第一階段 (205)	1 (0.5%)	94 (45.9%)	110 (53.7%)
第二階段 (1472)	57 (3.9%)	370 (25.1%)	1045 (71.0%)
$\chi^2 = 41.72^{***}$			
政治新聞			
第一階段 (131)	1 (0.8%)	62 (47.3%)	68 (51.9%)
第二階段 (580)	17 (2.9%)	229 (39.5%)	334 (57.6%)
$\chi^2 = 4.20$ (p = .14 in Fisher's Exact Test)			
經濟與社會新聞			
第一階段 (74)	0 (0.0%)	32 (43.2%)	42 (56.8%)
第二階段 (892)	40 (4.5%)	141 (15.8%)	711 (79.7%)
$\chi^2 = 36.66^{***}$ (p < .001 in Fisher's Exact Test)			

註：階段旁括號內的數字為樣本數。表格內主要數值為觀察數值和以每列作基礎的百分比。\*\*\* p < .001。

如果把政治新聞及經濟與社會新聞分開，我們可見，在第一階段，臺灣報章的中國政治新聞有 0.8% 屬正面，47.3% 屬負面，51.9% 為中性。在 1997 年至 2017 年，臺灣報章的中國政治新聞，有 2.9% 屬正面，39.5% 屬負面，57.6% 為中性。在 Fisher's Exact Test 中，兩個時期的百分比分布並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由此可見，雖然臺灣報章的



中國報導並沒有如預期般變得更負面，但在政治新聞中，負面新聞的下降或中性新聞的上升並不明顯。臺灣報章的中國新聞的「中性化」是由經濟與社會新聞帶動的，這很可能跟兩岸多了通商和社會交流，以及臺灣記者開始出入中國大陸有關。值得留意，在第一階段的 205 篇中國新聞中，只有 74 篇（36.1%）屬經濟與社會新聞，但在第二階段的 1472 篇報導中，經濟與社會新聞佔 892 篇（60.6%），經濟與社會新聞的比例明顯上升。與此同時，在第一階段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中，43.2% 屬負面，56.9% 屬中性，到了第二階段，負面報導比例大幅下降至 15.8%，中性報導則上升至 79.7%，甚至出現了 4.5% 的正面報導。在 Fisher's Exact Test 中，兩個時期的百分比分布出現了統計學上顯著的差異。

不過，兩個時期的臺灣樣本包含了不同的報章，在不同時期和不同題材上，臺灣報章之間有什麼差異？表 6 總括了相關的分析結果。在第一階段，《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的中國報導，在態度上並沒有顯著差異。《聯合報》的中國政治新聞，有 55.7% 屬負面，44.3% 為中性，《中國時報》的中國政治新聞，則只有 37.7% 屬負面，60.7% 為中性，《中國時報》表面上沒有那麼負面，但在 Fisher's Exact Test 中，兩個百分比分布差一點才能達至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在經濟與社會新聞方面，38.9% 的《聯合報》的報導為負面，61.1% 為中性。《中國時報》的負面報導稍多一點，有 47.4%，52.6% 為中性，兩個百分比分布在 Fisher's Exact Test 中亦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

表 6：臺灣報章的中國報導題材與報導傾向

	正面	負面	中性
政治新聞			
第一階段			
聯合報 (70)	0 (0.0%)	39 (55.7)	31 (44.3%)
中國時報 (61)	1 (1.6%)	23 (37.7%)	37 (60.7%)
$\chi^2 = 5.06$ ( $p = .053$ in Fisher's Exact Test)			
第二階段			
自由時報 (187)	2 (1.1%)	110 (58.8%)	75 (40.1%)
臺灣蘋果 (66)	0 (0.0%)	18 (27.3%)	48 (72.7%)
聯合報 (187)	2 (1.3%)	73 (48.3%)	76 (50.3%)
中國時報 (66)	13 (7.4%)	28 (15.9%)	135 (76.7%)
$\chi^2 = 90.48^{***}$ ( $p < .001$ in Fisher's Exact Test)			
經濟與社會新聞			
第一階段			
聯合報 (36)	0 (0.0%)	14 (38.9%)	22 (61.1%)
中國時報 (38)	0 (0.0%)	18 (47.4%)	20 (52.6%)
$\chi^2 = 0.54$ ( $p = .49$ in Fisher's Exact Test)			
第二階段			
自由時報 (214)	1 (0.5%)	55 (25.7%)	158 (73.8%)
臺灣蘋果 (246)	10 (4.1%)	19 (7.7%)	217 (88.2%)
聯合報 (190)	18 (9.5%)	32 (16.8%)	140 (73.7%)
中國時報 (242)	11 (4.5%)	35 (14.5%)	196 (81.0%)
$\chi^2 = 46.25^{***}$			

註：報章旁括號內的數字為樣本數。表格內主要數值為觀察數值和以每列作基礎的百分比。\*\*\*  $p < .001$ 。

在國民黨專政及報禁時期，不同報章之間沒有太大差異，並不出奇。到了民主時代，媒體系統出現了政治平行，媒體之間的差異也明確地出現。表 6 顯示，在第二階段，《中國時報》的中國政治新聞，持負面態度的比例降至只有 15.9%，同時，有 7.4% 的中國政治新聞持正面態度。《中國時報》的中國政治新聞的立場，在兩個時期之間的差異達至了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 ( $\chi^2 = 11.31, p < .01$ )，亦即是說，《中國時報》在第二階段比第一階段對中國的態度更正面。不過，同屬藍營的《聯合報》，則沒有這種顯著改變。在第二階段，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政治新聞比例為 48.3%，比第一階段的 55.7% 只低一點。值得指出的是，在第二階段，如果只計算《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兩份報章的中國政治新聞，在態度上是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的 ( $\chi^2 = 42.95, p < .001$ )。所以，在籠統的藍綠之分以外，同一陣營的報章也可以因擁有權或其他因素影響而出現差異。

藍營報章以外，雖然《臺灣蘋果》是《香港蘋果》的分枝，而《香港蘋果》對中共持批判態度，但《臺灣蘋果》的中國政治新聞很大程度上保持中性，負面報導比例只有 27.3%，比《聯合報》還要低。至於綠營的《自由時報》，則有最高比例的負面中國政治新聞 (58.8%)。將表 5 和表 6 一併閱讀，我們可以見到，臺灣報章的中國政治新聞，在兩個階段的態度分布並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但這個「不變」卻是一個複雜的媒體生態轉變的結果，包括個別藍營報章比以前更親中、綠營報章冒起，以及高度商業化的外來報章的出現。

至於臺灣報章在第二階段的中國經濟及社會新聞，於表 6 最下端顯示，媒體的政治平行在中國經濟和社會新聞中也有體現，但不同報章在這類新聞之上的差異，小於不同報章在政治新聞上的差異。《自由時報》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報導，負面的占 25.7%，《聯合報》和《中國

時報》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報導，負面的只占 16.8% 和 14.5%。《臺灣蘋果》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負面報導則更少，只占 7.7%。如果比較《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在兩個時期中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我們可見，兩份報章的報導均朝中性化的方向發展，兩份報章的轉變也達至統計學上的顯著度（《聯合報》： $\chi^2 = 14.14, p < .01$ ；《中國時報》： $\chi^2 = 23.49, p < .001$ ）。將表 5 和表 6 關於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的結果合併來看，臺灣報章在報導中國經濟與社會問題時的「中性轉向」，是適用於所有立場的報章的，縱使不同立場的報章之間仍有一些差異存在。

總括而言，臺灣報章的中國報導展現了一幅較為複雜的圖像，在報禁時期，臺灣報章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報導均高度負面，最主要的報章之間沒有明顯的差異。但走進民主化時期，不同立場的報章對中國政治的報導展現了非常不同的態度，但政治平行的出現和個別媒體的轉變卻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抵消，使得臺灣報章的中國政治報導在整體上沒有明顯的態度轉變。與此不同的是，在第二階段，無論是什麼陣營的臺灣報章，在報導中國經濟與社會時，都高度傾向中性，這也使臺灣報章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在兩個時期之間出現了高度「中性化」的轉變。

### 三、香港報章的中國新聞

最後，我們探討香港的狀況。表 7 顯示，香港報章的中國新聞的立場，在兩個時期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在第一階段，香港報章的中國新聞有 15.7% 持正面態度，8.9% 持負面態度，75.3% 為中性。在第二階段，相應的百分比非常接近，持正面態度的占 12.1%，持負面態度的占 10.4%，中性的占 77.6%。兩個時期的百分比分布在卡方測試中無顯著差異。所以，跟 H8 的預期不一樣，香港報章的中國報導，在回歸後在整體上並沒有變得較之前正面。

表 7：香港報章的中國報導傾向

	正面	負面	中性
第一階段 (527)	83 (15.7%)	47 (8.9%)	397 (75.3%)
第二階段 (994)	120 (12.1%)	103 (10.4%)	771 (77.6%)
$\chi^2 = 4.44$			
政治新聞			
第一階段 (305)	34 (11.1%)	26 (8.5%)	245 (80.3%)
第二階段 (447)	54 (12.1%)	42 (9.4%)	351 (78.5%)
$\chi^2 = 0.36$			
經濟與社會新聞			
第一階段 (222)	49 (22.1%)	21 (9.5%)	152 (68.5%)
第二階段 (547)	66 (12.1%)	61 (11.2%)	420 (76.8%)
$\chi^2 = 12.46^{**}$			

註：階段旁括號內的數字為樣本數。表格內主要數值為觀察數值和以每列作基礎的百分比。 $^{**} p < .01$ 。

如果把政治新聞和經濟與社會新聞分開，我們可以看見，香港報章的中國政治新聞的傾向在兩個階段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在第一階段，香港報章的中國政治新聞，11.1% 屬正面，8.5% 屬負面，80.3% 為中性。在第二階段，香港報章的中國政治新聞，12.1% 屬正面，9.4% 屬負面，78.5% 為中性。兩個時期百分比之間的差異極小。

有趣的是，在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中，香港報章在回歸後反而更少正面報導。在第一階段，22.1% 香港報章上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屬正面，9.5% 屬負面，中性報導占 68.5%。在第二階段，只有 12.1% 香港報章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屬正面，負面報導微升至 11.2%，中性報導

則占 76.8%。兩個時期的百分比分布在卡方測試中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回歸後，香港媒體關於中國經濟及社會的正面和負面報導，比之前更加「平均」。反而在第一階段，香港報章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較多傾向正面。

表 8 展示不同階段中不同香港報章的中國新聞的報導立場。不同於臺灣，香港報界的政治平行由來已久，在第一階段，《文匯報》的中國政治新聞有 26.3% 屬正面，其餘均為中性報導，完全不見負面新聞。

《明報》在這時期也有較多正面的中國政治報導，占該報的中國政治報導的 11.8%，負面報導只占 2.9%，其餘的為中性。在第一階段，《星島日報》的中國報導最具批判性，18.7% 的中國政治新聞屬負面，只有 0.8% 的中國政治新聞屬正面，這顯示了《星島日報》在該歷史時期的「右派」報章特徵。

到了第二階段，《文匯報》的中國政治新聞依然只有正面或中性報導。《明報》則走向中性，在這時期，10.7% 的《明報》的中國政治新聞帶正面傾向，帶負面傾向的有 9.4%，中性報導占 79.9%。不過，在卡方測試中，《明報》的中國政治新聞在兩個時間之間的態度差異並未達至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星島日報》。在第二階段，《星島日報》的中國政治新聞中，有 8.7% 屬負面，4.9% 屬正面，其餘為中性。《星島》的正面中國政治新聞仍不比負面的多，但相較第一階段，《星島日報》的中國新聞再沒有明確的負面取態。以卡方檢測，該報在兩個時期的中國政治新聞在態度上有統計學上顯著的差異 ( $\chi^2 = 7.61, p < .05$ )。至於在 90 年代才創刊的《蘋果日報》，其中國政治新聞有 21.3% 為負面報導，只有 2.2% 為正面報導。《蘋果》的出現，代替了右派報章成為媒體光譜的一端，保存了香港報業中的高度政治平行。

表 8：香港報章的中國報導題材與報導傾向

	正面	負面	中性
<b>政治新聞</b>			
<b>第一階段</b>			
文匯報 (80)	21 (26.3%)	0 (0.0%)	59 (73.8%)
星島日報 (123)	1 (0.8%)	23 (18.7%)	99 (80.5%)
明報 (102)	12 (11.8%)	3 (2.9%)	87 (85.3%)
$\chi^2 = 54.42^{***}$			
<b>第二階段</b>			
文匯報 (106)	31 (29.2%)	0 (0.0%)	75 (70.8%)
明報 (149)	16 (10.7%)	14 (9.4%)	119 (79.9%)
星島日報 (103)	5 (4.9%)	9 (8.7%)	89 (86.4%)
蘋果日報 (89)	2 (2.2%)	19 (21.3%)	68 (76.4%)
$\chi^2 = 62.90^{***}$			
<b>經濟與社會新聞</b>			
<b>第一階段</b>			
文匯報 (68)	34 (38.6%)	1 (1.1%)	53 (60.2%)
星島日報 (63)	3 (4.8%)	10 (15.9%)	50 (79.4%)
明報 (71)	12 (16.9%)	10 (14.1%)	49 (69.0%)
$\chi^2 = 33.11^{***}$			
<b>第二階段</b>			
文匯報 (147)	54 (36.7%)	8 (5.4%)	85 (57.8%)
星島日報 (143)	3 (2.1%)	19 (13.3%)	121 (84.6%)
明報 (101)	5 (5.0%)	3 (3.0%)	93 (92.1%)
蘋果日報 (156)	4 (2.6%)	31 (19.9%)	121 (77.6%)
$\chi^2 = 134.52^{***}$			

註：報章旁括號內的數字為樣本數。表格內主要數值為觀察數值和以每列作基礎的百分比。\*\*\* p < .001。

將表 7 和表 8 合併考慮，我們可見，香港報章在兩個時期內的中國政治新聞的取態，在整體上沒有顯著轉變。但如果仔細地看，個別報章的確有移向權力中心的跡象（《星島日報》），但也有報章嘗試以客觀中立作為定位（《明報》），而《蘋果日報》的出現，為整個媒體系統補充了批判性的報導。

表 8 也顯示，在第一階段，《文匯報》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中，有 38.6% 屬正面，只有 1.1% 屬負面，中性的有 60.2%。作為右派報章的《星島日報》，其中國經濟及社會新聞中有 15.9% 屬負面，只有 4.8% 屬正面，中性的有 79.4%。《明報》的中國經濟及社會新聞則較為平衡，正面及負面報導分別占 16.9% 和 14.1%。香港報章的政治平行在經濟和社會新聞中也有展現，而且報章之間在經濟與社會新聞上的差異，不比它們在中國政治新聞上的差異小。

到了第二階段，報章之間的差異仍然存在。《文匯報》在這時期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有 36.7% 屬正面，負面的只有 5.4%。在光譜的另一端，《蘋果日報》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19.9% 屬負面，正面的只有 2.6%。跟政治新聞不一樣的是，《星島日報》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的負面傾向並沒有大幅減低，在第二階段，《星島日報》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仍有 13.3% 持負面傾向，高於持正面傾向的 2.1%。《明報》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則維持正面和負面報導相約的狀態，但中性報導有明顯上升。在第二階段，《明報》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92.1% 屬中性。對照表 6，香港報章在回歸後少了正面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主因是《明報》大幅減少了正面報導。《明報》同時大幅減少了負面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但《蘋果》的出現卻補充了這些負面報導，使得在整體上，在香港報章的樣本之中，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的負面報導比例並沒有太明顯的下降。



總括而言，香港報章在兩個時期均展現了高度的政治平行，而這政治平行無論在中國政治或中國經濟與社會新聞中均有所體現。香港報章在整體上並沒有於回歸後變得對中國更正面看待，但這是因為個別專業報章仍然維持一定比例的負面報導，同時《蘋果》的出現也維持了負面報導的「供應」。

## 陸、總結及討論

上文分別分析了美國、臺灣和香港三地的報章如何報導中國，旨趣在了解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媒體系統中，不同媒體機構在多大程度上會在報導中國時展現不同的態度，以及媒體機構以至媒體系統的變遷如何塑造中國報導的變與不變。在本研究中，美國是一個參照點，關於美國個案的結果很大程度上再次印證了過往關於美國媒體的國際新聞研究發現。美國媒體在報導他國新聞時往往反映由政治精英建構的國家利益以及當下政府的外交政策（Lee et al., 2002），所以外交政策的轉變會反映在報導立場的轉變上。而在國家利益主導下，媒體機構之間的差異不會很大（Golan & Lukito, 2015），就算差異存在，也可以被理解為建制內部多元主義的體現（Lee, 2002）。

相比之下，臺灣及香港的情況則展現了媒體報導的複雜性。從 70 年代到現在，臺灣媒體經歷了由一元通向多元的媒體系統性轉變。報禁和民主化帶來新的媒體機構以及政治平行的出現。正如理論部分指出，媒體機構和媒體系統的發展是互動的，一個媒體如何定位，會視乎媒體市場中有什麼現存的機構。例如《自由時報》在 90 年代漸漸發展成綠營報章，而在臺灣社會的本土意識越益增強之時（Chu, 2004），《中國時報》卻因著擁有權的轉變和部分臺灣商界跟中國政府的緊密關係，走

向更加「親中」，占據著媒體光譜的一端。來自香港的《蘋果》則不太涉足臺灣政治，以商業化為賣點。香港的情況也類似，政權移交帶來了媒體系統的轉變，香港主流傳媒在 80 年代開始漸向中國傾斜，但由於香港社會確實有大量支持民主和抗拒中共的民眾，《蘋果日報》應運而生，以政治立場搶占市場份額。而《蘋果》的存在，也影響著其他媒體的運作，因為有了《蘋果日報》作為「出頭鳥」，其他報章的政治壓力也有所舒緩（Lee & Chan, 2009）。同時，當《蘋果日報》延續其批判報導時，其他媒體也不能在重要議題上明顯噤聲（Lee, 2018）。這些媒體系統的動態發展，可以模糊化宏觀權力結構轉變的影響。例如臺灣媒體的中國報導在整體上並沒有變得越來越負面，香港媒體的中國報導，至少截至 2017 年，也沒有在整體上變得越來越正面。

這裡，就著香港和臺灣的媒體現狀，我們要先加上一個補充。本文以報導展現出的對中國的態度為依變項，但這個依變項未必可以完全掌握媒體報導的一些系統性轉變。以香港為例，研究發現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導並沒有大幅減少。但這並不代表很多學者關注的自我審查現象（區家麟，2017；Lee & Lin, 2006）沒有發生。在回歸後的二十年間，香港是中國國境內一個「自由主義的例外地區」（Chan, Tang, & Lee, 2022, pp. 19-27），香港媒體仍有一定程度的新聞自由，媒體機構亦要平衡政治考慮和專業主義。因此，自我審查不會以最明顯的方式發生，自我審查最主要體現在媒體如何處理最敏感的問題和人物。放到本研究的發現，就是說回歸後首二十年的香港媒體，仍然會對中國政治和社會作出批判性的報導，但批判的力度可能比以往弱，亦不會觸及最敏感的議題。這些較為細緻的自我審查現象，不一定可以從正面和負面報導的比例反映出來。

不過，這局限並不妨礙本研究在理論和方法學層面的貢獻。在理論

方面，本文嘗試探討同一國家或地區內的媒體，在什麼情況下會於報導國際新聞時展現差異。我們在理論部分指出，這取決於兩大因素，第一是關聯政治（周葆華，2010）的強度，即媒體所報導的他國或國際事務跟本地政治的關聯程度。第二是媒體系統是否有高度的政治平行。對於美國而言，中國事務和中美關係跟美國內部政治不算有很強的關係，而美國媒體的政治平行程度素來不高，所以單一的國家利益概念很容易蓋過媒體機構之間的差異。與美國不一樣，在民主化後的臺灣以及不同時期的香港，媒體系統都有高度的政治平行，傳媒機構因著擁有者與政權或個別政黨的關係，可以在社會和政治議題上有不同的立場。中國問題緊扣著本土政治，如何看待中國大陸，無論在臺灣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競爭之中，抑或在過往香港民主派和建制派之間的競爭之中，都是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所以，臺灣和香港媒體的政治平行也會反映在中國報導之中。

再次強調的是，媒體系統存在著政治平行，不同媒體機構對同一對象或議題的態度有差異，不等於媒體系統整合起來不可以對該對象或議題有一整體態度。理論上，宏觀層面的國家和社會利益以及中觀層面的機構立場可以同時影響新聞內容。但本研究發現的是，在香港和臺灣，媒體的中國報導在整體上並沒有出現預期的轉向，這一定程度上顯示，在這兩個社會和在研究所覆蓋的時期，政治平行的影響蓋過了宏觀層面的國家和社會利益的影響。

當然，臺灣和香港媒體的中國報導，並不是最典型的「國際新聞」。回歸前的香港是一個原屬中國的英國殖民地，回歸後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國新聞其實是一種特殊的「國家新聞」（national news）。同樣地，中共強調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當局亦未放棄中華民國的國號，兩岸關係也不是一般的「國際關係」。不

過，我們相信，以上提到的理論觀點，是可以適用於一般較典型的國際新聞。正如文章在文獻回顧時指出，把外國的事情跟國內政治聯繫起來，其實並不罕見，如同 Castelló et al. (2013) 所述。另外，隨著網路的發展，媒體系統走向分眾，媒體的黨派傾向越見明顯 (Prior, 2013)，媒體轉變加上政治轉變，亦帶來民意兩極化，民意兩極化又強化媒體的黨派意識，就算是美國也有同樣的趨勢 (Iyengar, Lelkes, Levendusky, Malhotra, & Westwood, 2019)。所以我們相信，在關注國家利益和外交政策如何影響國際新聞之外，留意媒體系統裡不同媒體對國際事務的不同取態，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除了理論層面，本文章的分析也帶出了長時段比較研究中要面對的方法學問題。當媒體系統有重要的改變以及有新的媒體機構出現時，研究者要考慮如何抽取樣本和不同時期樣本的可比性。一方面，本文的分析表明，如果長時期的比較分析只包括一直存在的媒體機構，研究結果和結論很可能出現偏差。以臺灣為例，合理的比較分析不可能只聚焦在《聯合報》和《中國時報》身上。在香港的案例中，把《蘋果日報》排除掉，亦會令樣本不能反映回歸後香港媒體生態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的進路是希望不同時期的樣本都可以做到能在整體上代表當時的媒體系統。例如香港，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樣本包括了左、中、右的報章，到了 90 年代以後，樣本則包括了左派報章、在一定程度上被政權吸納的主流報章、嘗試以專業中立應對政治環境轉變的報章，以及開宗明義支持民主的報章。所以我們相信，兩個時期的樣本雖然包括了稍有不同的媒體，但它們在整體層次上的對比是有意義的。

不過，得承認的是，有一些更細緻的問題可能要由未來的研究者繼續探討。例如把不同類型或立場的媒體都包括在內，是否就足夠確保樣本的代表性？再以香港為例，在回歸後的二十年裡，蘋果日報大抵就是

唯一開宗明義支持民主派的報章，但由中共直接控制的左報就有三份，一定程度上被政權吸納的主流報章也有多份。那麼，樣本中的四份報章應該有一樣的權重嗎？這問題也許沒有簡單答案，因為雖然民主派報章就只有《蘋果日報》，但《蘋果日報》對社會和媒體系統的影響卻比其他報章大。說到底，我們也許沒有唯一最好的樣本建構方法，但樣本的代表性及其限制是一個要留意的問題。

本研究把 1977 年至 2017 年分成兩個階段，首階段為 1977 年及 1987 年，第二階段為 1997 年至 2017 年。誠然，這個二分法部分建基於研究的實際限制，即研究只包括五個特定年分。我們的研究設計不能掌握到一些較短期的波動，如臺灣民主化後國民黨執政期間和民進黨執政期間的差異，又或者香港在 2010 年起社會動員和中港矛盾漸生的影響。這有待未來研究作補充，但我們相信，在短期的起跌之外，一個較長的時期仍可以有其總體特徵和傾向，把不同年分合併起來成為兩個階段，可以得出較具理論意義的結果，而本研究得出的發現，也應該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點。

作為結語，本文為美國、臺灣及香港三地報章在過去四十多年來如何報導中國提供了有用的數據，包括整體層次上報導所展示的態度的變與不變，以及個別媒體機構的立場的轉變。對國際新聞的研究，本文提出，在國家利益和外交政策以外，媒體立場的影響，會在關聯政治及政治平行程度均高的地方尤為顯著，而媒體立場可能影響報導內容，也促使研究者要對樣本建構問題格外留神。我們希望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就著相關的理論和方法問題作進一步的闡釋和探討。

## 參考書目

- 李立峯、鄧鍵一（2013）。〈社會變遷、媒體互動，以及電臺聽眾參與節目在香港的演變〉，《傳播與社會學刊》，24: 23-60。
- 周葆華（2010）。〈內外之間的關聯政治：中國電視國際新聞研究——以 CCTV《新聞聯播》為例〉，《傳播與社會學刊》，13: 37-74。
- 梁麗娟（2006）。《蘋果掉下來》。香港：次文化堂。
- 陳致中（2016）。《臺灣報業：歷史、現狀和展望》。臺北市：風雲時代。
- 區家麟（2017）。《二十道陰影下的新聞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Alasuutari, P., Qadir, A., & Creutz, K. (2013). The domestication of foreign news: News stories related to the 2011 Egyptian revolution in British, Finnish and Pakistani newspaper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5(6), 692-707.
- Althaus, S., Edy, J. A., Entman, R. M., & Phelan, P. (1996). Revising the indexing hypothesis: Officials, media, and the Libya crisi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3(4), 407-421.
- Archetti, C. (2010). Comparing international coverage of 9/11: Towards an interdisciplinary explan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s. *Journalism*, 11(5), 567-588.
- Bennett, L. W. (1990). Toward a theory of press-stat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0(2), 103-127.
- Bergman, T. (2014). Following Washington's lead: The Dutch press on the run-up to the war in Iraq.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6(2), 109-127.
- Castelló, E., Dhoest, A., & Bastiaensens, S. (2013). The mirror effect: Spanish and Belgian press coverage of political conflicts in Flanders and Catalon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 1622-1640.
- Chan, C. K., Tang, G., & Lee, F. L. F. (2022). *Hong Kong media: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a,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Chan, J. M., & Lee, C.-C. (1991).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s orbit*.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Chen, S. Y. (1998). State, media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 11-29.
- Cheng, D. X., & Lee, F. L. F. (2015). Journalist-source relations: The case of Taiwan correspondents in China. *Journalism Studies*, 16(6), 850-867.
- Chu, Y.-H. (2004).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prospec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ian Survey*, 44(4), 484-512.
- Clausen, L. (2004). Localizing the global: "Domestication" processes in international news

- produc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6(1), 25-44.
- Cohen, A. (Ed.). (2013). *Foreign news on television: Where in the world Is the global village*.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Cohen, A., Levy, M. R., Roeh, I., & Gurevitch, M. (Eds.). (1996). *Global newsrooms, local audiences: A study of the Eurovision news exchange*. London, UK: J. Libbey.
- Denham, B. E. (2014). Intermedia attribute agenda setting in the New York Times: The case of animal abuse in U.S. horse racing.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1(1), 17-37.
- Gans, H.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NY: Vintage.
- Golan, G. (2006).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 and global news coverage: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York Times on three network television evening news programs. *Journalism Studies*, 7(2), 323-333.
- Golan, G. J., & Lukito, J. (2015). The rise of the dragon? Framing China's global leadership in elite American newspaper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7(8), 754-772.
- Ha, J. S. (2017). Tailoring the Arab Spring to American values and interests: A framing analysis of US elite newspapers' opinion piec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9(3), 276-297.
- Ha, J. S., & Shin, D. (2016). Framing the Arab Spring: Partisanship in the news stories of Korean newspaper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8(6), 536-556.
- Hallin, D. C. (1986).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in, D. C., & Mancini, P. (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nusch, F. (2008). Valuing those close to us: A comparison of German and Australian quality newspapers' reporting of death in foreign news. *Journalism Studies*, 9(3), 341-356.
- Ho, M. (2019).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Ho, M. (2021). "Dried mango": Taiwan's fiercely democratic young voters. *Th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2, 197-203.
- Hsu, C.-J. (2014). China's influence on Taiwan's media. *Asian Survey*, 54(3), 515-539.
- Iyengar, S., Lelkes, Y., Levendusky, M., Malhotra, N., & Westwood, S. J. (2019).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129-146.
- Jang, W. Y. (2013). News as propagand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S and Korean press coverage of the six-party talks, 2003-2007.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5(2), 188-204.
- Ji, C., & Liu, H. (2022). State as salesm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gagement and foreign

- news coverage in Chin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9(1), 122-145.
- Kim, K., & Shahin, S. (2020). Ideological parallelism: Toward a transn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test paradigm.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9(4), 391-407.
- Kim, S. T. (2000). Making a difference: U.S. press coverage of the Kwangju and Tiananmen pro-democracy movemen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7(1), 22-36.
- Lee, C.-C. (2000). The paradox of political economy: Media structure, press freedom, and regime change in Hong Kong. In C. C. Lee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pp. 288-336). Illinois,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Lee, C.-C. (2002). Established pluralism: U.S. elite media discourse about China policy. *Journalism Studies*, 3(3), 343-357.
- Lee, C.-C., Chan, J. M., Pan, Z., & So, C. Y. K. (2002).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ee, C.-C., & Yang, J. (1996). Foreign news and national interest: Comparing U.S. and Japanese coverage of a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Gazette*, 56(1), 1-18.
- Lee, F. L. F. (2018).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Hong Kong media. *China Perspectives*, 2018(3), 9-18.
- Lee, F. L. F., & Chan, J. (2009). Organizational production of self-censorship in the Hong Kong med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4(1), 112-133.
- Lee, F. L. F., Chan, J. M., & Zhou, B. (2011). National lenses on a global news event: Determinants of the politic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of the prelude to the Beijing Olympic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274-292.
- Lee, F. L. F., & Lin, A. M. Y. (2006). Newspaper editorial discourse and the politics of self-censorship in Hong Kong. *Discourse & Society*, 17(3), 331-358.
- Lee, S. H., & Wang, Q. (2016). 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into press-state relations: Comparing source structures in three news agencies' coverage of the North Korean missile cri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 1907-1928.
- Ma, E. K. (1999). *Culture, politics and television in Hong Kong*. London, UK: Routledge.
- McCourt, D. M. (2021). Framing China's r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ternational Affairs*, 97(3), 643-665.
- Medeiros, E. S. (2000). China, WMD proliferation, and the "China threat" debate. *Issues & Studies*, 36(1), 19-48.
- Ojo, T. (2016). Framing of the Sino-Africa relationship in diasporic/pan-African news magazine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9(1), 38-55.
- Ooi, S.-M., & D'Arcangelis, G. (2017). Framing China: Discourses of othering in US news and political rhetoric. *Global Media and China*, 2(3-4), 269-283.
- Peng, Z. (2004).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An across time analysis of coverage i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Los Angeles Time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4(1), 53-67.



- Prior, M. (2013). Media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6, 101-127.
- Rawnsley, G. D., & Rawnsley, M.-Y. T. (2006). The media in Taiwa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D. Fell, H. Klöter, & B.-Y. Chang (Eds.), *What has changed? Taiwan before and after the change in ruling parties* (pp. 225-242). Wiesbaden, GE: Harrassowitz.
- Rawnsley, M.-Y. T., & Feng, C. (2014). Anti-media-monopoly policies and further democratis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3(3), 105-128.
- Roy, D. (1996). The “China threat” issue: Major arguments. *Asian Survey*, 36(8), 758-771.
- Shoemaker, P. J., & Reese, S. D. (1991).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s on mass media content*. New York, NY: Longman.
- Tanikawa, M. (2017). Seeking cultural relevance: Use of “culture peg” and “culture link” in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ing. *Journalism Practice*, 11(1), 115-133.
- Tanikawa, M. (2019). Is “global journalism” truly global?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s of the global, cosmopolitan and parochial conceptualizatio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20(10), 1421-1439.
- Wilke, J., & Achatzi, J. (2011). From Tian’anmen Square to the global world stage: Framing China in the German press, 1986-2006.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348-364.
- Willnat, L. & Luo, Y. (2011). Watching the dragon: Global television news about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255-273.
- Yang, Y. E., & Liu, X. (2012). The “China threat” through the lens of US print media: 1992-200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76), 695-711.
- Yu, G., & Wang, M. (2017). The change of Beijing image in the foreign media: An analysis of coverage by mainstream English media. *Global Media and China*, 2(3-4), 333-351.
- Zaller, J., & Chiu, D. (1996). Government’s little helper: US press coverage of foreign policy crises, 1945-1991.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3(4), 385-405.
- Zhu, J., & Lu, J. (2013). One rising China,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China’s 6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world’s printed med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84), 1067-1088.

# News about China in Changing Media System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S., Taiwan, and Hong Kong Newspapers

Francis L. F. Lee, Ping Shaw, H. Denis Wu\*

## ABSTRACT

Journalism research has long emphasized that foreign news is shaped by elite-defined national interests. Scant studies have address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rganization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changes in media systems over time.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ing literature by examining whether differences between organizations exist in the U.S., Taiwan, and Hong Kong news coverage of mainland China and how the evolution of such differences over time shaped the appearance and

---

\* Francis L. F. Lee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is the lead author of *Memories of Tiananmen: Politics and process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 in Hong Kong, 1989-2019*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1) and *Media and protest logics in the digital e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He is also the current Chief Editor of 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an elected Fellow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E-mail: francis\_lee@cuhk.edu.hk.

Ping Shaw is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gender and media studies, advertising and culture, media texts, and content analysis. She has been published widely in referred journals, includ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ew Media and Society*, *Sex Roles*, etc. E-mail: shawpin@cm.nsysu.edu.tw.

H. Denis Wu is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at Bosto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e has been published widely in refereed journals and co-authored books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media and politics, including *Media, politics, and Asian Americans* (Hampton) and *Image and emotion in voter decisions* (Lexington). E-mail: hdw@bu.edu.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coverage.

This study theoretically draws upon the literature of journalism studies and explicates the dominant perspective that foreign news is shaped by national interests as well as how an emphasis o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o a lesser extent, cultural factors limit researchers'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 these differences in foreign news reporting.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differences between organizations are likely to be prominent when "linkage politics" is strong and the degree of media political parallelism is high. Linkage politics refers to the degree to which foreign even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closely tied to or even integrated with local politics, whereas media political parallelism denotes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media system of a society contains outlets of different political predilection that can be located on a spectrum parallel to the spectrum existing in the political arena. Since both domestic politics and media systems might evolve over time, the strength of linkage politics and the degree of media political parallelism can also vary over time, thus resulting in possible distinctive manifestations of between-organizations' differences in foreign news reporting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Given th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project compares how U.S., Taiwan, and Hong Kong newspapers covered China between 1977 and 2017. The U.S. represents a relatively stable media system with a low degree of media political parallelism through the entire period under study.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have not been clearly and strongly mapped onto the divide between the two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former. Taiwan, by comparison, experienced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ts media system changed from one dominated by pro-government parties to one that exhibits a high degree of political parallelism.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s have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shifts over time, with the late 1970s to the early 1990s being a period of re-

engagement between the two regim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2000s onward as a period in which the two moved further away from each other ideologically. Hong Kong also experienced an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from being a British colony to being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in the period under study. Its media system has long exhibited a significant degree of political parallelism, but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political parallelism has shown changes in accordance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Hypotheses and research questions are set up for each of the three places based on both conceptual and contextual considerations. The hypotheses and research questions are then tackled with data derived from content analysis of newspapers in the U.S. (*New York Times* and *Wall Street Journal*), Taiwan (*China Times*, *United Daily News*, *Taiwan Apple Daily*, and *Liberty Times*), and Hong Kong (*Wen Wei Po*, *Sing Tao Daily*, *Ming Pao*, and *Apple Daily*). The two U.S. newspapers are among the most prominent national papers in the country and represent the more liberal and more conservative perspectives, respectively. The Taiwan newspapers include both pro-KMT and pro-DPP outlets, as well as the more neutral and commercial-oriented *Apple Daily*. The Hong Kong newspapers include pro-government, pro-democracy, and more neutral professional newspapers. Five specific years (1977, 1987, 1997, 2007, and 2017) are analyzed and separated into two period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1977 and 1987 vs. 1997, 2007, and 2017).

The results show minimal differences among newspapers on China coverage in the U.S. While U.S. media coverage of China had become more negative over time, a finding consistent wit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ing U.S.-China relationship over the years, this trend exists in both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n contras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newspapers in China coverage in Taiwan, especially in the second period when Taiwan's political system became democratized and its media

system exhibited a strong degree of political parallelism. *China Times* and *United Daily News* became less negative toward China over time, but the emergence of *Liberty Times* meant that there was no lack of negative coverage toward the mainland. The result is that, overall speaking, Taiwan newspaper coverage of China did not exhibit a significant shift in tone.

There are simila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Hong Kong newspapers in their China coverage. Individual newspapers exhibited different kinds of changes over time, with *Sing Tao Daily* becoming less negative toward the mainland on political issues after the handover, whereas *Ming Pao* exhibited a higher degree of balance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verages during the post-handover period. Nevertheless, the publication of *Apple Daily* ensured the supply of negative coverage about the mainland. As a result, there was also no overall shift in tone in Hong Kong newspapers' coverage of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handover. In other words, in both Hong Kong and Taiwan, changes in specific news organizations' approach to China and the impact of emerging media outlets cancelled out each other, leading to apparent continuity in China coverage.

The analysis herein thus largely supports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 that, in places where linkage politics is strong and the degree of media political parallelism is high, there could be significant between-organizations' differences in foreign news coverage. This study points toward how foreign news coverage needs to be understood in relation to factors beyond elite-defined national interests. The findings also hint at the need for caution when sampling media outlets for longitudinal studies of how a country or society's media cover a certain topic. Variou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in the concluding section.

**Keywords:** compara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news, linkage politics, media systems, News about China, political parallelism

• 新聞學研究 • 第一五六期 2023 年 7 月